**克莱门特信念合理性思想论析[[1]](#footnote-0)**

陈丽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Clement’s Thought on Rational Meanings of**  Religious Belief

——The Tension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in Early Times

摘要：理性与信仰的张力问题自基督宗教发端之时就已存在，公元1-3世纪，亚历山大城教理学校的教父哲学家们选择了一条理性辩护主义的调和主义路线，在原则上规定了信仰先于知识、高于哲学的立场，试图说明两西文明实质上是一致的。他们一方面使用希腊哲学那种理性的推理方法证明基督宗教信念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指出了这种理性推理的局限性，从而说明信仰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早在公元3世纪，克莱门特从知识论的角度推理论证了信仰在知识中的重要地位，他对信仰在知识中地位的论述在现代知识理论中也有重要的意义，现代宗教哲学家们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宗教信念合理性思想。

关键词：亚历山大学派；克莱门特；基督宗教信念；认知合理性

理性与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两大基本要素，两者之间的张力自基督教思想产生之始就已存在，宗教信念一直都在与主流思想进行对话与调和。1-3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查士丁、克莱门特、奥利金等早期教父哲学家们站在调和理性与信仰的立场上，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基督宗教信念的认知合理性问题是伴随基督教的产生而同时出现的，基督宗教继承和吸收了犹太教经典和古希腊罗马文化，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使它必然要经历种种冲突与挑战。公元2到6世纪，基督宗教受到希腊哲学和希腊-罗马社会的质疑和挑战，这个时期同时也是基督教传播、发展并取得统治地位的关键时期。希腊护教士查士丁活动于公元1世纪早期，他是最早把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结合起来的基督教哲学家，从基督教圣道与希腊哲学的关系的角度为基督教的认知合理性做了最早的辩护。公元2世纪后期，潘陀纽斯、克莱门特、奥立金等亚历山大城教理学校的先驱们持信仰先于知识、高于哲学的立场，继续以希腊哲学为工具，为基督宗教信念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克莱门特是继斐洛、查士丁之后第一位运用古希腊哲学为基督宗教信念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哲学家，因此被冠以“基督教哲学之父”之名，基督教思想披上了希腊哲学外衣，同时，希腊哲学也有了新的内容，初步形成了系统的基督教哲学。克莱门特的信念合理性思想正是以希腊哲学认识论为工具，一方面为希腊哲学家始终在追寻的真理问题提供了有总结性和创建性的答案，另一方面也为基督宗教信念的合理性做了认识论意义上的辩护。奥立金的工作比他的老师克莱门特更近一步，他综合希腊哲学和神圣智慧，使之成为更加完整的基督教哲学体系。亚历山大学派在3到4世纪成为基督教神学的中心，主导着教会的思想，它所开拓的基督教哲学为中世纪及以后的基督教哲学家运用理性为信仰辩护奠定了基础，有着及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希腊哲学与真理的关系**

认识论，或者说知识论，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即什么是知识？我们如何获得知识？我们如何确定我们知道？[[2]](#footnote-1)古希腊哲学家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柏拉图将认识分为理念世界——知识和现象世界——意见；亚里士多德对认知过程的分析，认为真理性认识是通过理性推理获得的；斯多葛学派的芝诺认为真理性的认识是在理性思维的帮助下使知觉与对象相符合的认识。亚历山大里亚教理学校的克莱门特继潘陀纽思之后，借鉴了希腊哲学理性推理的传统处理基督宗教知识合理性问题，走了一条理性推理的中间路线，这与2、3世纪基督教内部形成的其他两种立场，即诺斯替派和原教旨主义是不同的，他的著作有着浓厚的理性思辨色彩。

公元1世纪，当基督教作为新的文化进入雅典城时，对于传统的希腊思想是一种挑战，同时这一挑战也是构成了一次“历史的转折点”[[3]](#footnote-2)。首先，基督宗教认识论与希腊哲学的认识论是不同的。希腊哲学家自古就持有知识的自然起源观念，而作为相对新的基督教思想则认为知识来源于上帝的意志，即使是面对知识来源于上帝这个终极原因，希腊哲学家还要继续追究“上帝的意志从哪里开始”[[4]](#footnote-3)。在希腊哲学家看来，理性是认识真理的最重要因素，人是“理性动物”，其最主要的能力或者说最基本的形式就是理性，[[5]](#footnote-4)正如柏拉图所说，知识不是通过教导而获得的，而是理性有方向性的选择。[[6]](#footnote-5) 然而，基督教思想认为认识真理就是认识上帝，关于上帝的知识是建立在见证之上的历史性知识，对于这种自上而下的历史性知识的正确态度就是相信，真理性认识从坚定的信念开始，在经验中获得。[[7]](#footnote-6) 其次，希腊哲学中的神是非人格的、理性化的神，基督教的神是被抽象为最高理性原则的人格神。在希腊哲学家面前，一位有人格性的神是荒谬的，而在基督教神学家看来人如何崇拜一个抽象的、缺乏感性特征的神，神应该是有位格的神，有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这决定了人类被救赎的可能性。

基督教神学面对希腊思想有诸多的困难，一方面，正是因为希腊哲学家提出的责难，使基督教神学家不得不在希腊哲学的话语体系中进行基督教信念认识合理性的辩护，这就涉及到希伯来和希腊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问题；另一方面，追求理性主义的希腊哲学和信仰至上的基督宗教的冲突，在基督教产生初期表现尤为突出。基督教面临的是上帝的人性与神性、超越性和可知性的关系问题。在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下，基督教思想难免与希腊-罗马文化相互借鉴，异教徒也因为这种文化的融合而逐渐接受基督教，因此，“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思想”[[8]](#footnote-7)形成了。

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斐洛是第一个调和希腊文化与希伯来宗教精神的犹太哲学家。他认为，犹太经典和柏拉图著作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只是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因此《旧约》所使用的隐喻语言可以被“翻译”成希腊哲学语言，他将柏拉图的理念和斯多葛学派的逻各斯引入犹太教，解释困扰犹太教徒的问题，如：“上帝如何支配万物”、“人如何认识上帝”[[9]](#footnote-8)，逻各斯作为上帝与世界和人的中介，创造、支配世界和人，同时，因为人的理性分有逻各斯，所以人可以通过逻各斯认识上帝。斐洛开启了利用希腊哲学为宗教信念的认知合理性进行辩护的先河，为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开创基督教哲学起到重要的启发和铺垫作用，克莱门特也因此被称为“基督教哲学之父”。

克莱门特综合了基督教神学与中期柏拉图主义（Middle Platonism），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亚历山大犹太哲学（Jewish-Alexandrine philosophy）和诺斯替主义（Gnosticsim）。上帝内在于所有生命，与人的灵魂直接相关，这是克莱门特思想的基础。斯多葛哲学认为使整个宇宙成为一个伟大而理性的生物体的原因是永恒的、内在的、充满的（permeative）的宇宙灵魂，也就是世界本原，即逻各斯，这深深影响了克莱门特的思想。他也受到使徒约翰（St.John）和使徒保罗（St.Paul）的直接影响：“起初是逻各斯；一切都由逻各斯而来”，“因着上帝，我们生存、活动以及是我们所是。”[[10]](#footnote-9)在对待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时，克莱门特说：“在认识上帝之前，哲学对于希腊人寻找真理是必要的……它通过表达而成为获得真理的一种准备训练。哲学是将希腊思想带领到基督的导师，正如律法曾经要带给希伯来人的那样。”[[11]](#footnote-10)尽管希腊哲学低于基督教信仰的完美，不过它对基督教徒们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基督徒们针对敌人的攻击，在希腊哲学中能找到最好的武器，[[12]](#footnote-11)希腊哲学只是永恒之道（真理）的片段，但也“来自上帝的智慧和力量”[[13]](#footnote-12)。

希腊哲学的起源的问题在犹太——亚历山大哲学和查士丁的哲学中已经形成，克莱门特继承并发展了他们的思想。《创世纪》第2章第7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人类的理智就是上帝用尘土造人后吹在他鼻孔里的“生气”，“神吹入人体的气息就是理智的气息”[[14]](#footnote-13)，理智来自上帝。上帝的气息让每个人都具有“天生的观念”或“共同的理性”，希腊哲学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能掌握真理的某些因素。为了说明理性的神圣来源，克莱门特仰赖斐洛使用过的降雨的比喻来说明上帝将“神圣的智慧”如降雨般赐给人们，人们都具有神性智慧这一点是无需解释的，这也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体现。他用希腊哲学的“逻各斯”来解释人人皆有的“天生的观念”或“共同的理性”，希腊哲学家凭借逻各斯来思考和追寻永恒真理，来自最高神的逻各斯就是智慧之源，人的理性是神圣逻各斯形象式摹本。这早在查士丁的哲学中已有体现，首先，在《护教篇》中他首先把希腊哲学归因于人的理性，而人的理性是神性逻各斯的摹本，类似于理性是对神性逻各斯的分有和描摹的柏拉图学说；其次，哲学家凭着神性逻各斯的摹本，能够获得关于真理的朦胧知识，这不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同时神性逻各斯也通过播种的方式把哲学直接“播”进哲学家们的心中。克莱门特认为哲学家除了需要神圣逻各斯作为正确的智慧，同时还需要圣灵的激励，因此，他把毕泰格拉及其学生、柏拉图都说成是受圣灵指引，用神圣逻各斯达到对部分真理的认识的先知，他们都是受到圣灵启示的人。

克莱门特进一步说希腊哲学并非希腊人的原创发明，而是来自于更为古老的文明，那就是犹太经典。斐洛在其著作中认为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学说来自于摩西，希腊律法是对犹太律法得模仿；查士丁持相似的观点，认为柏拉图的学说同样得益于摩西甚多。不难看出，克莱门特借鉴了前人的学说，坚持希腊哲学要么是窃自先知们，要么是某些哲学家凭借“天生的观念”或“共同的理性”达到对真理的部分认识或着是模糊认识。塞尔瓦托·利拉（Salvatore R.C.Lilla）在其《亚历山大的克雷芒》一书中例证了克莱门特和塞尔索的思想也有着相似之处[[15]](#footnote-14)，都认为希腊哲学并非希腊人的原创发明，而是来自于更为古老的文明，得益于《旧约》，有着神性起源。

二、信仰在知识中的地位

希腊哲学家（如Celsus和Galen）指责基督教唯独信仰（Only believe），而对教义从来没有理性的解释。对此，克莱门特运用理性，并结合神学知识给予回击，他所做的努力为基督宗教知识确立一个无可厚非的基础，维护其认知合理性。克莱门特关于哲学（理性）来源的定义决定了他认为哲学可以作为工具来为基督宗教的认知合理性辩护。哲学同样来自于上帝的启示，但哲学不同于基督教真理之处在于，它是真理的片段亦或扭曲，或者说是部分的真理和朦胧的知识，哲学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它在寻求真理之路上的困难，只有“希望、选择、感知、聆听上帝才能发现终极的、无需证明的真理”。[[16]](#footnote-15) 哲学是为上帝的真理所做的准备。

克莱门特从“先在的知识”（preconception）[[17]](#footnote-16)来说明“信念”（belief）在认识中的地位，需要强调的是，他是在严格的宗教意义上使用术语“信念”的，因此在下文中均使用“信仰”（faith）这一术语来展开论述他的学说。伊壁鸠鲁学派认为“先在的知识”的作用是，人们在面对大量感知信息的情况下，使获得知识成为可能；心灵从互不相干的印象（images-）中选择并形成独立的认知起点——“先在的知识”。伊比鸠鲁之后，“先在的知识”成为哲学家们公认的认知前提，只有通过“先在的知识”，我们才能认知不同的事物，哲学思考才有可能。那么“先在的知识”从何而得呢？有三种途径：“取决于感觉的重复（D.L. ІO.33; Epicurus, ep. Hdt. 37f, 或者是天生的、内在的（Cicero,ND 1.44）, 或者是根深蒂固的观念（一种比较中立的观点）（Plutarch, comm.not. ІO59c）”[[18]](#footnote-17)，第一种是伊壁鸠鲁学派的观点，第二种是晚期斯多亚学派的观点，第三种是古代斯多亚学派的观点。克莱门特认为，首先，“作为’信仰’的信念”[[19]](#footnote-18)就是“先在的知识”，信仰是赞同或决定，而非天生的或内在的东西，它需要通过聆听《圣经》中上帝的声音获得；其次，“先在的知识”先于知识，作为获得知识的可靠基础，或者说是第一原则，必须是无需证明和不可证明的。[[20]](#footnote-19)也就是说，为了避免三难悖论（Agrippa’s Trilemma）[[21]](#footnote-20)，必须有一个自明的开端，这个开端就是信仰，信仰也是判断的标准。克莱门特正是基于采纳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真理性知识是一种证明性知识的看法，[[22]](#footnote-21) 提出信仰就是证明那无可厚非的、自明的基础和开端，为基督宗教的认知合理性找到了理性的诠释，同时，也为哲学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开拓了视野。

克莱门特所说的认知的开端——信仰，并不是天生具有的，而是通过选择而获得。芝诺认为真理性的认识是无法被驳倒的，认识主体对外界事物的印象与认知客体相符，这需要认知主体进行判断和“赞同（assent）”。西塞罗认为通过理性来把握和认识事物，不可能没有“赞同”。这也就是说，如果首先没有对认识对象的认同，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把握，更无法获得知识。西塞罗主张“赞同”是内在的，“先在的知识”发生于内在具有的“赞同”，感觉把对事物的印象传达给理智（mind），由理智做出评定,有智慧的人只对认知的印象给予赞成，并且是无误的，无知是因为变化和认同度低。“赞同”的学说影响了克莱门特，他提出在理性缺失时，人的认识要倚靠信仰。当我们遇到自明的、晦暗的、矛盾的、或者是有不可辩驳的一面等这类问题时，理性便不能做出判断和赞同，这时就要倚靠信仰。

三、知识的更高形式

克莱门特没有停留在依靠“作为信仰的信念”而获得知识这个层面，他的目的是将他的基督教宗教的“信念”学说解释为一种更高的知识形式，就是“真知”。古希腊哲学家普遍认为，人的认知是从感觉开始的，并且人类的认知和知识是有限的。泰勒斯通过审视物质世界的本源而扩展了人类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这一举动的意义在于肯定了人可以通过自身能力来扩展认知范围，而不仅仅依靠神的启示，但这种乐观的认识论在怀疑论者那里受到严重的挑战，以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及其之后的认识论都显示出神学目的论的倾向，即便是在希腊衰落时期，伊比鸠鲁有无神论倾向，但之后的斯多葛学派，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斯多葛主义更是强调通过“与神同一”而达到真理性的认识。

古希腊哲学从米利都学派到爱利亚学派关注的是自然本源的问题，爱利亚学派之后的哲学家逐渐把注意力从自然转向了人，更多地讨论人如何获得知识以及认知对象的特征。德谟克利特将认识分为“真理性的认识和暧昧的认识”，五官的视、听、嗅、味、触就属于“暧昧认识”，而真理性的认识需要一种“更精致的工具”，那就是理性，感觉认识和理性认识都是可靠的，感觉和理性各司其职，相互依靠；普罗泰格拉认为“知识就是感觉”；怀疑主义更是主张人无法认识，比如，高尔吉亚的“无物存在”，“如果有事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知，也无法把他说出来告诉别人。”[[23]](#footnote-22)亚里士多德不赞成柏拉图的纯粹理念，他强调感官认识在获得知识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由感官获得认识对象的印象，然后再进一步运用判断来获得知识，而科学的知识需要得到证明，证明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坚实的基础就是第一原则。罗马帝国后期，普罗提诺将认识过程中对理性的应用解释为与神达到合一的手段。这些共同构成了克莱门特的基督宗教认识论的思想基础和来源。

克莱门特认为一般人会将认识停留在感官认识的层面，这种感官的认识并不能认识到真理。感觉（perception）是我们经验的第一步，通过感觉，认识对象才能进入理性认识阶段，但是只有在信仰中的感觉才能无法被怀疑或辩驳，才能排除假设等不确定的因素，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信仰下的视、听、嗅、味、触来自三一上帝，才能“去除嫉妒和贪婪这类障碍”[[24]](#footnote-23)，引导感觉，辨别真伪。“自然人不会接受来自上帝的东西”[[25]](#footnote-24)，那些谈论神圣的人们，包括野蛮人和希腊人已经在谜团、象征、寓言和隐喻中遮蔽了第一原则（first principles）[[26]](#footnote-25)，一般人将停滞于感觉，而宗教信徒必须揭开这遮蔽。柏拉图认为通过感官而获得的是意见，他反对那些认为所有的存在都可以通过双手来认识和把握的人。克莱门特进一步说，那些仅限于五官感觉的人不能认识真理。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它不能让人认识真理，正是因为这一点，保罗没有把信仰归因于人的智慧，而认为信仰是独存的，不需要证明。不能被证明也不可证明的“第一原则”是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逻辑的关键所在，他在⟪形而上学⟫中说：“并不是所有的示范都是相似的:这个过程会持续以至无限，所以仍然没有示范”[[27]](#footnote-26)，在《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一定存在无需证明的第一原则，但这并非亚里士多德的原创，早在柏拉图或别处就已存在，“这种绝对原理学说，柏拉图将它当作辩证运动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把它等同于可信的和不待证明的原理。不管怎么说，这种绝对原理的学说已经成为学院派—传统的组成部分。没有一部讨论逻辑和认识论学说的著作可以忽略它。所以，要是它也出现在中期柏拉图主义中，是毫不奇怪的。”[[28]](#footnote-27)真理是古希腊哲学家们为之不懈追求的目标，克莱门特为寻求真理这项事业提供了一种基督教信念中的认识路径。绝对的第一原则，即信仰，是克莱门特认识论的基础，所有的认识都要以“无需证明的、不证自明”的信仰为前提，它是认识的起点。信仰不仅是认识的起点，获得真知的先决条件，也是判断何为真知的标准，根据克莱门特的说法，判断事物是否为真理应在认识事物之后，而且由信仰来判断。

因为“第一原则”不能被证明也不可证明，所以不能被那些处理可变性事物的技艺（techne）和审慎(phronesis)实践所认识，只有信仰才是第一原则或第一原因。任何知识都有被教授的可能性，而教授本身要以先在知识为基础，但是泰勒斯等希腊哲学家并不知道第一原则。因为没有人能教授第一原则，所以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成为掌控者。“信念是一种内在的善，它没有去寻求神就承认神的存在，就把神看做存在的。”[[29]](#footnote-28) 作为信仰的信念来源于对上帝的敬畏、上帝的荣耀和道。上帝的荣耀和道直接反应在《圣经》中，那么，“通过无需证明的《圣经》本身”和“用《圣经》建立起来的每一个要点”[[30]](#footnote-29)作为证明的出发点，其结果就是真知。克莱门特虽然强调信仰在获得知识中的绝对地位，但也重视对信仰的理解和论证，他说：“对一些基本要点进行理解的知识就是信仰，这种知识比通过信仰接受的东西更加坚强，是经过证明的，是建立在对主的教导的信仰上的，能使人无误，有知识，能理解。”[[31]](#footnote-30)信仰不仅是论证的出发点，同时也是理解的对象，对信念的理解和获得知识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既不存在没有信念的知识，也不存在没有知识的信念。克莱门特进一步提出了“普通的信念”和“有知识的信念”的区分。“普通信念”或者说是“单纯的信仰”就是接受不证自明的《圣经》，这是证明的原理；“有知识的信念”是通过对《圣经》的研究而获得的，它与由证明产生的科学知识是一回事，“有知识的信念”就是“真知”，是知识的高级形式。“普通信念”必然会发展成为真知，因为《圣经》的内在意义被文字隐藏，按照信仰第一原则的证明原理，经过对《圣经》内在意义的研究，从而获得真知。这样，克莱门特就将“信仰”和“真知”的必然关系与科学的论证等同起来，希腊哲学的论证传统与基督教信念并不冲突，“通过强调单纯的’信念’，凭借科学证明（即凭借对《圣经》的解释）必须发展成为’真知’”。

克莱门特不仅仅建构了一个理性的、系统的、信仰中的中期柏拉图学说，而且继承了保罗那种对所有人开放的模式，使读者更觉得熟悉，为基督信仰起到很好的铺垫作用。他辩论的细节与晚期希腊哲学认识论紧密相关，他的方法不是将具体内容放进某个系统，而是尽可能地扩大范围，也就是说，他不是将神学放进哲学系统，也不是将哲学放进神学系统，而是扩大了神学体系，同时也扩大了哲学体系。他为信仰辩护的目的是向哲学家和神学家说明，信仰不是否认理性，而是理性的起点和持久的完整性。克莱门特从哲学入手证明基督宗教信念的合理性，向人们证明基督信仰是认识的普遍基础和评价标准，它使每个人有了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使人们认识真理成为可能。[[32]](#footnote-31) 他对信仰与知识关系的论述在现代知识理论中也有重要的意义，现代认识论也认为“信念”对知识有重要的意义。

**四、克莱门特信念合理性思想在现当代的发展**

现当代哲学家们看到了理性的局限性，也看到了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主流虽然是理性，但是信仰还一直保留着自己的位置。他们提出不是任何知识都由理性推理而来，理性缺席是常见的情况，而且也有很多理性推理无法触及的地方，这个时候信念在获得知识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宗教哲学家们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论证了宗教信念的正当合理性。正如当代哲学家克拉克所说，古典启蒙运动的认识论将人们引入越来越狭窄的认识道路，古典基础主义对宗教信仰的合理性的批判是片面的，它使理性的功能有失偏颇。[[33]](#footnote-32) 早期宗教哲学家们提出信仰与理性并不是相互排斥，信仰并不违背理性义务，理性也不能完全脱离信仰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并且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了信仰与理性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关系。

托马斯阿奎纳和克莱门特一样，使用古典基础主义的推理规则，提出认识对象的“形式方面”[[34]](#footnote-33)，建立在“第一真理”之上，使用上帝启示中的推理方法或“形式方面”，得到的结果就是真理。托马斯•阿奎纳区别了两种认知途径，一种是建立在第一原则基础上的自然理性认知途径，另一种是信仰途径，即通过特殊启示和上帝的话语认识到看不见的上帝，从而认识真理，因为上帝才是真理的来源。按照认知习惯来看，每一个认知对象包括两方面：一是物质对象；二是对象的“形式方面”(the formal aspect of object)。 比如，对几何学来说，其得出的结论是物质性的，证明推理的方法就是认识对象的形式层面，通过这个“形式方面”才能得出结论。阿奎纳认为，作为认识对象的“形式方面”在信仰的关照下就是“第一真理”（the First Truth）。信仰不是对任何对象的赞同，信仰只能是上帝的启示，它所依靠的方法（或者“形式方面”）是永恒真理，在上帝的启示中，人才能找到通往真理的方法。那么，在上帝启示下的信仰对象就是第一真理。信仰对象是第一真理，并且第一真理是简单的，但是对第一真理的理性理解是复杂的。人们往往使用命题的方式，通过归纳分析来理解这个命题，从而试图进一步获得真理，这就使本来简单的真理变得复杂了。为了更加清楚的说明信仰对象是第一真理，阿奎纳对科学对象是否可以作为信仰对象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科学研究对象和信仰对象不同，同一个对象不可能被同一个人既可以感官观察到，同时又作为信仰的对象，同样，同一个对象不可能同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信仰的对象。所有的科学都是从“自明”推理而来，并且是可见的原则，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可见的，所以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信仰对象，信仰不需要推理证明。阿奎纳认为那些不能或者尚不能通过理性推理而获得的知识，就得先通过信仰来获得。而且，理性的认识是渐进的，每个人的学习过程都需要信念，信念可以帮助人更好的获得知识，宗教信念或者“超自然的善”（Divine goodness）可以让科学认识更加完美。[[35]](#footnote-34)

然而，当代哲学家们认为无论是克莱门特还是托马斯阿奎纳都是在证据主义的规则内处理理性与信仰张力问题，而建立在古典基础主义之上的证据主义的假设“歪曲了我们关于宗教信念的合理性的概念”[[36]](#footnote-35)。普兰丁格、詹姆斯、C.S.刘易斯、克拉克、沃特斯多夫等人揭示了古典基础主义和证据主义的致命缺陷，正如里德所提出的，能够被哲学家证明的事实在太少了，我们那些缺乏严格推理论证的日常信念是否该弃绝？如果弃绝缺乏严格推理论证的日常信念，我们还能获得知识吗？那么，哲学家们对推理的单独推崇是否合理？

实际上，克莱门特和托马斯阿奎纳虽然使用了古典基础主义的推理规则，但同时他们也发现了理性的局限性。如上文中讨论过的，克莱门特在论述信仰在知识中的地位时，提出在理性缺失时，人的认识要倚靠信仰；阿奎纳也提到那些不能或者尚不能通过理性推理而获得的知识，就得先通过信仰来获得。他们都肯定了信念在获得知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修正了基础主义的推理规则的缺陷。

基础主义是关于合理性信念结构的理论，它的基本方案就是要确定哪种信念是“恰当基本信念”[[37]](#footnote-36)，即那些得到辩护的基本信念，并且在恰当基本信念的基础上建立起严格的知识信念结构。必须确保基本信念的绝对真理性，并且使用保持真理的推理规则，把基本信念的绝对真理性延伸到每一个推理结果中。对于古典基础主义者来说，恰当基本信念有三种：即感觉明显的，自明的，或者是哲学家所谓的无法更改的（incorrigible）命题。建立在古典基础主义之上的证据主义认为相信上帝不能确定是一个恰当的基本信念，需要一个论证的证据性支持。普兰丁格直接回击了古典基础主义，反问古典基础主义本身是属于恰当的基本信念吗？古典基础主义不能满足它自己提出的合理性要求，不能为自己辩护，它是“自指性的牴牾”，以古典基础主义为根基的证据主义更是无法立足的。沃特斯多夫切中基础主义要害，指出基础主义崩溃的原因就是其本身的苛刻性。我们可以例举出很多基础主义和证据主义不适用的范畴，比如道德问题或者人际关系问题，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知识的获得难免参杂意愿的选择，而不是单靠证据推理。宗教信念不能以科学实验的方法对待，因为就连科学也不能保证是完全依靠证据主义的推理规则。

现代哲学家们不仅指出了基础主义和证据主义的缺陷，并且继续对古典基础主义进行修正。普兰丁格认为古典基础主义对“恰当基本信念”的界定过于苛刻，导致本该属于基本信念的命题被排除在外，使人们错过真理的可能性很大，因该扩大基本信念的范围。[[38]](#footnote-37) 他接受加尔文的观点，认为信仰是一种特殊的知识，需要特殊的认知过程，即信念－产生机制（belief-producing mechanism），“在恰当的环境中，依据一个以真理为目标（并且是持续成功的指向真理）的设计蓝图，认知能力和认知过程都恰当运行，然后产生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获取知识所需要的。在这个有圣灵参与的过程中产生的信念是真理性的信念，由于信仰由信念构成所以信仰就是可靠的。因此，信仰下的信念就为知识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信仰为知识提供了担保，担保的程度越强，对某些问题的信念就越能够成为知识。”[[39]](#footnote-38) 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信仰上帝也是恰当的基本信念。里德提出了里德基础主义，他认为“我们知识信念功能一般能产生合理的信念，理由之一就是他相信我们的认识装备是创造者赋予我们的”[[40]](#footnote-39)，他扩大了基本信念的范围：“自明的，感觉明显的或不可改变的信念，记忆的信念，对过去的信念，对外面世界的信念，对其他思想的信念，对别人见证的信念，等等，简而言之，所有我们即时产生的信念”[[41]](#footnote-40)。克拉克在其《重返理性》中总结性地指出古典启蒙运动以来的认识论把理性引向了越来越狭窄的道路，而且古典基础主义以及证据主义对宗教信念合理性的驳斥同样是再误导理性，使理性的功能有失偏颇。然而，“一个顺着里德和普兰丁格所发展的有神论认知路线，会准确地捕捉到我们有关合理性信念的结构的直觉。” [[42]](#footnote-41)这似乎意味着人们要重新思考现有的理性推理规则及其标准，在理性与信仰的张力中反思理性的功能。

**参考文献：**

［1］Clement. *The Stromata.*

［2] Baergen, Ralph.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epistemology(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religions, philosophies, and movements; no. 70)*,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Lanham, Maryland∙Toronto∙Oxford, 2006.

[3] Rufus M. Jones, M.A., D.Litt, *Clement of Alexandria: Selection from his Writings.*, Headley Brothers, Bishopsgate, London, E.C.

[4] Eric Osborn, *Clement of Alexand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 D.K. Glidden, *Epicurean prolepsis*,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Ⅲ , Oxford, 1985.

[6] Aristotle, *Metaphysics,Written 350 B.C.E* ,Translated by W. D. Ross, Book IV.

[7] E.F.Osborn, *The making of orthodoxy*, FS for H. Chadwick, ed. R.Williams, Cambridge, 1989.

[8] Greco, Jone, *The Blackwell Guid to Epistemology*, Blackwell Guid to Epistemology, 1999.

[9] Salvatore R.C.Lilla, *Clement of Alexandr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10] Rodney Stark,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HarperCollins,1997

[11] Hans Boersma, *Heavenly Participation.*

[12] Jaroslay Pelikan, Jesus Through the Centuries-His Place in the Centur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 Robert Louis Wilken, *The Spirit of Early Christian Thought- Seeking the Face of God-Yale*, Yale University, 2003.

[14] Etlenne Gilson, *Elements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Greenwood Press, 1978.

[15] Malcolm Schofield, Myles Burnyeat, Jonathan Barnes, *Doubt and Dogmatism-Studies in Hellenistic Epistem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6] David E.Cooper, *Epistemology the Classic Reading*,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17] Lloyd p. Gerson, *Ancient Epistem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Kelly James Clark, Return to Reason: a critique of Enlightenment evidentialism and a defense of reason and belief in God,1990

[19]（意）塞尔瓦托·利拉著，范明生等译, 亚历山大的克雷芒[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20]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

[21]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美）斯图尔特（Stewart, M.）宗教哲学经典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

[22] 翟志宏、徐玉明，必然性知识与宗教信念的合理性意义：论克莱门特辩护思想对亚里士多德知识论的运用 [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76卷，第6期 2014年11月

1. 作者：陈丽，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宗教学专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3BZX05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410500024） [↑](#footnote-ref-0)
2. Greco, Jone, *The Blackwell Guid to Epistemology*, (Blackwell Guid to Epistemology, 1999),1-2 [↑](#footnote-ref-1)
3. Pelikan, *Jesus Through The Centuries-Hi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Yale University, 1985),21 [↑](#footnote-ref-2)
4. Robert Louis Wilken, *The Spirit of Early Christian Thought- Seeking the Face of God-Yale*, (Yale University, 2003), 14 [↑](#footnote-ref-3)
5. “The primary operative power of man is that in virtue of which he is called a ‘rational animal’, and since reasoning is a certain discursive use of the intellective power, this intellective and reasoning power can be called the very form of man.” Gilson, *Elements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Greenwood Press, 1978), 225 [↑](#footnote-ref-4)
6. “knowledge, in the relevant sense, is not ‘introduced into a mind’ by teaching, but is the result of a certain ‘orientation’ of the mind.”David E. Cooper, *Epistemology: The Classic Readings*,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99), 14 [↑](#footnote-ref-5)
7. Robert Louis Wilken, *The Spirit of Early Christian Thought- Seeking the Face of God-Yale*, (Yale University, 2003), 7,15,166-70. [↑](#footnote-ref-6)
8. Hans Boersma, *Heavenly Participation,* 33 [↑](#footnote-ref-7)
9.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4页 [↑](#footnote-ref-8)
10. Rufus M. Jones, M.A., D.Litt, *Clement of Alexandria: Selection from his Writings*., Headley Brothers, Bishopsgate, London, E.C., p.15 [↑](#footnote-ref-9)
11. Clement. “The Miscellanies”, *The Stromata*, Book VI, chap.X VII [↑](#footnote-ref-10)
12. （意）塞尔瓦托·利拉著，范明生等译：《亚历山大的克雷芒》，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1,12页。 [↑](#footnote-ref-11)
13. Clement. “The Miscellanies”, *The Stromata*, Book I, chap.X VII [↑](#footnote-ref-12)
14. Clement. “The Miscellanies”, *The Stromata*, Book V, chap.IVC III. [↑](#footnote-ref-13)
15. 根据利拉（Salvatore R.C.Lilla）的论述，克莱门特和塞尔索的不同之处在于，克莱门特主张希腊哲学是“希腊人的剽窃”，其目的在于将希腊哲学的来源归宿于“神性逻各斯”，有神性起源，主要得益于《旧约》；而塞尔索则极度强调犹太教和基督教两者都依赖希腊哲学传统，而希腊哲学来源于“以前的逻各斯”，将哲学的和宗教的学说回溯到极其古老的、“聪明的”和“神性”的种族，“就他们古老的范围而言，他们拥有一种神圣性，并通过人类的历史，把一切都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神圣的传统，……野蛮人、希腊哲学家和诗人都是这种传统的阐述者。”其指责的对象是犹太教和基督教。 [↑](#footnote-ref-14)
16. Eric Osborn, *Clement of Alexand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82 [↑](#footnote-ref-15)
17. Clement. “The Miscellanies”, *The Stromata*, Book Ⅷ, chap.III-IV. “Preconceptions are ‘a kind of *epiblole tes dianoias*,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mental visions by their generic content’”, D.K. Glidden, *Epicurean prolepsis*,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Ⅲ , Oxford, 1985, p.194. [↑](#footnote-ref-16)
18. Eric Osborn, *Clement of Alexand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85 [↑](#footnote-ref-17)
19. （意）塞尔瓦托·利拉著，范明生等译：《亚历山大的克雷芒》，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39页。 [↑](#footnote-ref-18)
20. Clement. “The Miscellanies”, *The Stromata*, Book VIII, chap.III. [↑](#footnote-ref-19)
21. “ …(a) an infinite regress, (b) a dogmatic assumption for which we are unwilling or unable to give further reasons, or (c) a repetition of some reason already thus a circle in our reasoning, William calls this skeptical problematic ‘Aprippa’s Trilemma,’” Greco, Jone, *The Blackwell Guid to Epistemology*, (Blackwell Guid to Epistemology, 1999), 3-4 [↑](#footnote-ref-20)
22. 详见于翟志宏、徐玉明，必然性知识与宗教信念的合理性意义：论克莱门特辩护思想对亚里士多德知识论的运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76卷，第6期 2014年11月，19-27. [↑](#footnote-ref-21)
23.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38页。 [↑](#footnote-ref-22)
24. “Obstacles like jealousy and greed must be cleared away”(Stromateis 5. І.Ⅱ) [↑](#footnote-ref-23)
25. “For there are to be no pearls cast before swine; the natural man does not receive the things to

God” (Stromateis 5. І.І2.56 also 5.4.25) [↑](#footnote-ref-24)
26. 克莱门特这里所说的第一原则是信仰第一原则。“ For Theophrastus, Clement tells us, perception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faith. From perception the first principles(archai)come to our reason and intellect(logos, dianoia), especially when the voice of God is perceived in scripture.” (Stromateis2.2.9) Eric Osborn, *Clement of Alexand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88 [↑](#footnote-ref-25)
27. ‘There cannot be demonstration of everything alike: the process would go in to infinity so that there would still be no demonstration’ Aristotle, *Metaphysics,*Written 350 B.C.E ,Translated by W. D. Ross, Book IV, IOO6a6 [↑](#footnote-ref-26)
28. （意）塞尔瓦托·利拉著，范明生等译：《亚历山大的克雷芒》，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35页。 [↑](#footnote-ref-27)
29. Clement. *The Stromata*, Book VII, chap.LV II [↑](#footnote-ref-28)
30. Clement. *The Stromata*, Book VII, chap.XCVI I、V [↑](#footnote-ref-29)
31. Clement. *The Stromata*, Book VII, chap.LVII III [↑](#footnote-ref-30)
32. 信仰某一标准或规则是古希腊哲学家普遍认同的客观真理，标准或规则可以有效回击怀疑主义者对真理和知识的挑战。斯多葛主义者和伊比鸠鲁主义者坚信依照某一标准或规则可以发现真理。见于E.F.Osborn, ‘Reason and the rule of faith in the second century’, in *The making of orthodoxy, FS for H. Chadwick,* ed. R.Williams, Cambridge, 1989, p. 41-61. [↑](#footnote-ref-31)
33. Kelly James Clark, *Return to Reason: a critique of Enlightenment evidentialism and a defense of reason and belief in God*,1990, p.117. [↑](#footnote-ref-32)
34. “the formal aspect of object”, （美）斯图尔特（Stewart, M.）宗教哲学经典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第46页。 [↑](#footnote-ref-33)
35. （美）斯图尔特（Stewart, M.）宗教哲学经典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第46-47页。 [↑](#footnote-ref-34)
36. Kelly James Clark, Return to Reason: a critique of Enlightenment evidentialism and a defense of reason and belief in God, p.130. [↑](#footnote-ref-35)
37. Ibid. “properly basic beliefs”. [↑](#footnote-ref-36)
38. A.Plantinga *Belief without Evidence*,p.423-424. [↑](#footnote-ref-37)
39. “beliefs that constitue faith”，（美）斯图尔特（Stewart, M.）宗教哲学经典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36页。普兰丁格拒绝了古典基础主义的合理性概念，但没有认为任何信念都是合理的，他虽然没有对提出合理性提出另外的说法，但向我们提示了里德评估这种标准的方法（《Reason and Belief in God》74-78）：“适当的方法为归纳法；认识论者应该将他认为是恰当的基本信念集合起来，进而根据这已被聚集的众信念归纳出一个合理的原则，在另一方面，有人可能会从一个理论或原则出发，根据该原则来判断每条信念。这正是古典基础主义所用的方法。” “从理论出发去探讨理性不如从信念出发来导出理论可取。有神论者可以把相信上帝列为范式性基本信念之一，根据这一组的信念来规范他合理性的原则。按照这理论，很多信念将被排除。因此，这种方法会驳倒’拒绝古典主义会导致不卞良莠，一视同仁的现象’的指控”，（美）克拉克著，唐安译，重返理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112－113页。 [↑](#footnote-ref-38)
40. Kelly James Clark, *Return to Reason: a critique of Enlightenment evidentialism and a defense of reason and belief in God*,1990, p.117. [↑](#footnote-ref-39)
41. Ibid.p151. [↑](#footnote-ref-40)
42. Ibid.p158. [↑](#footnote-ref-41)